

一個與民工同行的故事

梁孝慈

二零零五年初夏的一個晚上，我與幾個朋友在上海一家館子吃飯。他們中有一些是跟我一樣

由跨國企業派遣到中國的職業經理人，也有從事教育事業的工作者。雖然服務的行業不同，但我們都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我們都是「老外」（筆者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但因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所以從傳統角度來說也屬「老外」）。其次，我們有著共同的信仰。最後，我們心中多少都有一點不安的感覺，並不是我們的工作或家庭給我們什麼壓力，而是因為我們都看到社會上所存在

的一些不公義，心理感到了不舒服，並想做點什麼讓世界美好些。

從參觀訪問民辦學校開始

有經濟學者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不錯，不少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商業集團已經看到了中國低廉的生產成本所帶來的吸引力，並紛紛在中國建立其生產基地。一些在中國舉行的舉世矚目的盛會，例如奧運會和世博會也在另一方面推動了國內基礎建設的速度。此外，改革開

放後先富起來的一群人，海歸一派和外企人員也產生了對其生活相關服務的需求。這些現象在無形中，都吸引著眾多城鎮外來務工人員（俗稱「農民工」，下稱「民工」）並促使其離鄉背井，奔著這些就業機會，而來到較富有的大城市打工，希望多賺點錢。

據《文匯報》二零零四年五月報導上海統計局調查報告顯示，上海已經有二百七十多萬民工，在全市就業人口中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九點五。這些民工就在我們周邊，分佈在各個行業，有的當建築工，有的當車間普工，有的當飯館服務員、按摩師、「阿姨」（即「鐘點工」），以及司機等等。然而，由於受戶籍限制，這些民工在來到大城市後頻頻遭受就業歧視以及其他不公待遇，例如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工作時間長、工資收入較低，以及難以按時足額領取等。此外，相對而言，民工的勞動條件較為惡劣，勞動安全難以得到保障，職業病問題嚴重，而維權管道又不

暢通……想到這裡，我們幾個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商量後便一拍即合地鎖定了一個目標：要嘗試服務這一群處於社會邊沿的弟兄姐妹。

通過與受雇於我們自身企業的民工交談，我們瞭解到除了一些涉及其不公平待遇的問題，我們最希望得到改善的是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據我們理解，在二零零五年，上海已經有差不多四十萬隨遷的適齡流動兒童，他們大多在校舍簡陋、教學品質差，而且得不到地方政府認可的外來人員自辦的民工子弟學校（下稱「民辦學校」）就讀。筆者曾走訪了數十所民辦學校，吃了不少閉門羹，但也有幸遇到了一些比較開明的校長，願意和我們作進一步交流。我們發現這些民辦學校的教室普遍非常擁擠，師生比例不協調，課程僅涵蓋基本科目，而缺乏針對小孩德智體群美全面開發的活動或課程。

參觀訪問後，我們決定著手開始幫助一些民辦學校改善校舍設施（例如：操場、圖書館、視

聽設備等），又爲它們提供現金補貼以資助其招聘較優質英語老師，並改善師生比例失調的問題。我們也組織安排了大學生週末到一些民辦學校義務教授英文。此外，還組織了在上海的國際學校學生與民辦學校學生進行交流互動，如開展相應的體育和文藝競賽，並爲兩者的中英語言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管道。我們還定期爲民辦學校學生舉行聖誕派對，秋遊和夏令營等活動。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與民工同行的。

有了初步的服務體驗，我們便迫不及待與更多朋友分享我們對民工的瞭解，並開始邀請更多有相同意願的人加入到我們的服務團隊中來。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我們需要有個被識別的身份。經反復討論，我們制定了我們的宗旨，就是「與民工同行」。具體來說，就是通過提高社會關注，整合夥伴資源，爲民工家庭提供實質性支援。我們還爲這個年輕的團體取了一個挺有意思的中文名字：「憂道」。（《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君子

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二零零八年的轉捩點，挑戰和機遇並存

二零零八年對於「憂道」而言，無疑是一個轉捩點。首先，政府開始逐步正視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推出政策讓隨遷子女按照和公辦學校學生一樣的標準，享受免除學雜費的待遇，政府按評估把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合併，或通過補貼把它們轉成公辦，旨在實現讓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這無疑是個大喜訊，然而對於「憂道」而言，經過幾年的努力，剛剛在服務民辦學校的工作有一點成績，如何能相應調整其服務方式呢？

我們認爲靈活性和適應能力是服務本領域的必備條件。新推出的政策迫使我們走出之前的舒適地帶，尋找繼續服務的新思路。我們開始走進民工生活的社區，看到了不少學前幼童因經濟

等原因而失學、輟學在家。究其原因，原來學前教育不屬於政府規定的義務教育範圍之內。充分認識到學前教育的重要，我們便向一些非正規幼稚園（「山寨幼稚園」）的園長提出建議，表示我們願意資助貧困或有特別需要的家庭，使他們的孩子可以入讀幼稚園。同時，我們繼續用之前的方法資助幼稚園的園舍設施、師資和課餘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著重家訪。對於「憂道」來說，家訪並不是一個資產收入評估調查，而是讓我們跟民工交朋友的一個機會，能讓我們深入地瞭解他們的境況、困難和希望，也讓他們能反過來瞭解我們。一直以來，我們堅持對受助家庭安排每月一次的家訪，按需要為他們送衣服棉被並解決其他家居具體問題。

二零零九年，作為「憂道」轉折後的第一年，我們就資助了幾十個小朋友。在剛結束的學年，受助於「憂道」的小朋友已經過百。

隨著我們對服務對象和內容擴大和延伸，我

們也需要更多資源，希望更多社會人事參與我們的工作。我們認為「憂道」需要一個完善的治理結構，財政要透明，應被打造成一個「信得過」的慈善機構。無奈中國政府一直對國內的非經濟機構從嚴監管，特別是對於從事慈善事業的外國團體抱著很大的不信任，在中國進行機構註冊幾乎不可能。（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後，中國慈善法的制定一拖再拖，至今尚未頒佈。）另一方面，我們也考慮過與中方單位合作一起註冊，但考慮到我們的服務範圍可能會被縮小，從而使我們失去應變能力，或被合作方主導，以使「憂道」變質。（這樣的案例在中國為數不少。）所以，我們最後決定退而求其次，並於二零零八年在香港註冊，成爲一個受到香港官方認可的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然而，這個執照並不解決「憂道」在內地運營的實際問題。比如：招聘本地員工、國內場所租賃、募集捐款等。雖然迄今爲止，我們還沒有找到簡單完美的解決方案，但通過依託成員

的專業知識、企業管理經驗，以及各方好友的支援，我們總能為這些運營問題找到相應的可操作的方法。「憂道」雖未在中國合法註冊，但近幾年來以其實際的工作以及廉潔規範的作風，很快便得到一些外國商會、跨國企業以及體育協會等的青睞。除了我們的本份工作，我們也開始為這些戰略夥伴度身定做年度的合作計畫，開闢新的服務領域。

如果要把「憂道」的工作看成三步曲，我們認為第一步是跟學校合作；第二步是走進社區；而第三步則是在第一第二步的基礎上為民工家庭創建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家庭中心」。

「家庭中心」

經過大半年的選址籌備，「憂道」第一個家庭中心終於在二零一零年成立。中心除了提供常規親子活動、圖書館、週末手工班、電影分享、戲劇工作坊外，還邀請不同的個人、企業或團體

前來舉辦一些定期或不週期性活動，比如：健康講座、中醫義診、蛋糕烘焙等。內容可謂是豐富多彩。前來參加中心活動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憂道」也被越來越多的民工視作一個信得過的機構而將其困難訴諸於我們。我們曾經收到過一個求救電話，一個受助家庭的母親失蹤了，希望我們幫助尋人；又一次，筆者半夜裡接到電話說有兩個父母離異的年輕人在街上流浪，需要安全的收容所。這樣類似的求助還有很多。當然，我們並非每次都能幫忙解決問題，但我們心裡還是感到十分欣慰的，因為以此可見我們真正成爲了民工家庭的可靠朋友。

然而樹大招風，經營了不到兩年，中國有關政府部門便要求我們停辦該家庭中心，因為我們沒有相關的批文和執照。筆者曾屢次上訪政府領導，介紹「憂道」的背景和宗旨，以及家庭中心所提供的服務物件和內容，希望釋除他們的疑慮。然而，政府領導說中心提供的服務性質類似

於教育，而教育是一項政治任務，為國家培育愛黨愛國的下一代，不容有失。而我們跟民工孩子的接觸是被認為有污染小孩子思想的嫌疑的。後來，那位領導坦白和我說，他明白我們做的都是好事，只希望我們離開他負責的地區，或者把我們的資源投放在傷殘老年等風險比較低的人群。

我們服從政府的明確指令。懷著沉重的心情，把大門關上，把中心的牌匾拿了下來。儘管如此，我們服務民工家庭的熱忱並沒有減退，我們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在另一個地點將中心以一個經調整的面貌重新投入服務。總結了經驗，這次的重啓比之前低調得多：沒有開幕式，沒有掛牌，也不邀請社會朋友搞活動。

多年後回顧

根據上海統計局公佈二零一一年底的資料，上海總人口達二千四百萬之多，其中流動人口佔九百六十萬，當中七成是民工，隨遷的民工

子女超過五十萬。相比二零零五年，上海民工的人數差不多翻了一番。由於政府推出政策和社會各方的努力，最初對民工危害最為直接和重大的欠薪、社會保障、子女上學等問題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決和改善。與此同時，民工這一群體本身也發生了各式各樣的變化。其中，新生代民工逐漸構成民工群體的主力。相對於第一代進城務工的父輩，他們在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自身定位和追求上都有顯著不同；新生代民工更加認同自己是城鎮人口，也更希望在城鎮穩定地生活。他們有新的問題也有新的訴求。這些都預示著「憂道」今後工作的新機遇和新挑戰。

這就是我們與民工同行的故事。在這些日子裡，我們看到很多民工朋友任勞任怨，堅毅不屈，默默地為社會作貢獻，也聽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對於所有參與過「憂道」工作的朋友們來說，我想這些經驗無疑能很好地幫助我們反思生命的意義，並進而激發我們感恩之情。

□